



山东大运河的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

范玉刚 许诗怡

摘要:在场景理论的重新语境化中,如何形成高度认同和共识性的评价体系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转换成中国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至关重要。山东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其蕴含的历史文化资源,对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开发需要把场景概念与地方发展关联起来,将其放在公共空间、文化活动与市民消费体验等元素共同组成的文化场景中来审视。通过对文化符号的选取和城市文化记忆的重构,探求文化空间与场景营造的山东经验,以及多维度反思大运河文化带场景建构存在的现实困境,以阐释发掘山东大运河文化资源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场景理论;山东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空间;场景塑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3-0059-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运河文化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国家的重要文化遗产。当代文化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大运河的发展语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如何在这一背景下保护好、利用好大运河并使其有机融入社会发展,是一项重要命题。山东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全长643公里,占京杭运河总长度的三分之一,是文献记载中通航条件最困难、通航时间最长、维修保护工程技术最复杂同时也最精妙的著名河段”^[2],其地处大运河中枢区段,是贯通运河南北的重要河段,也是全方位展现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代表性区域。山东大运河主河道流经18个县(市、区)^①,其中包含了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的遗产点,孕育了大运河文化带山东段的主要文化空间。在此区域内一些著名的沿河古镇大多是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

与码头,至今仍保留了许多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遗迹^②。在建设国家城市文化公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机遇下,山东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全方位促进山东大运河的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为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提供山东实践,不仅有利于弘扬与延续中华历史文脉,更能有效提升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场景理论内涵的阐释与应用的合理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文化在经济调节、利益分配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驱动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从资本、劳动力、资源禀赋等资源型要素,逐

收稿日期:2022-04-06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研究”(18ZD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范玉刚,男,文学博士,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美学及文艺学理论研究。许诗怡,女,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步向人才、文化、创新等知识型要素转变”^[3]。文化赋能城市经济,成为推动经济、拉动内需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区更新和旧城改造以及文化作为重要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社会购买力,促进社会就业增长,实现与其他产业的互动共赢发挥了先导性作用,甚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和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动能之一。在此境遇下,场景理论赢得了出场机遇,特别是北美芝加哥学派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授等人提出的城市场景理论,更是受到很多城市管理者和文化学者的青睐。

(一)场景理论的内涵

场景理论是芝加哥社会学派近年来提出的从文化、消费、空间整合的角度解释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范式^③。新芝加哥学派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授在《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一书中,通过论证北美多个城市的发展实例,从有功能导向的空间观念和有价值取向的场景概念出发,提出了对“场景”内涵的多维度阐释:一是强调对特定活动的共同兴趣;二是强调特定地点的特质;三是强调焦点在于某个地点的美学意义^④。进而将场景理论视为一种对城市发展的分析方法,从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两大角度重新审视城市更新与转型的驱动力培育机制。通过分析舒适物不同的组合形式所创造出来的独特场景,来审视消费人群的空间行为及其对现代生活秩序的塑造作用,重新定义城市经济、居住生活、政治和政策等。具体而言,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场景理论视域下,场景是一种由消费、体验、符号、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组成的文化空间。场景理论强调文化消费的重要性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认为“美学和表现力可以创造全新的经济产业和工作类别”^{[4]20}。同时,它强调生活文化设施不是孤立的存在,认为不同的生活文化设施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指出“场景,尤其是那些有更多选择的、自我表达的、越轨的、迷人维度的场景,也为经济创新提供了关键的刺激作用”^{[4]19}。它以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助推力,将文化要素与科技创新元素融入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强调文

化空间作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着力于研究“聚集城市增长发展的文化动力,尤其是市民文化参与、消费与娱乐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5]。进而将文化实践作为一种形态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道路,并赋予“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

其次,场景理论强调城市精神的重要性,“每个场景都包含不同的活动和经验,同时,这些经验反过来通过对各种舒适物设施的有效使用而得到促进”^{[4]41}。城市特色文化场景,作为感知城市风貌的重要场所,孕育着城市的文化特质,重塑城市的精神内涵,又“吸引着不同群体前来居住、生活和工作,从而驱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6]。通过与科技、产业、服务等各领域的融合,依靠场景符号输出文化和价值观,传承文化传统,形成抽象的符号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人群,继而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创造力,不断提升城市文化的吸引力,激发城市集体记忆,实现国家认同。

最后,场景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场景所产生的“热议点”不仅可以用于“交换金钱和信用等其他资源,也可以成为政治武器、动员群众的工具等”。“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不同愿景——嵌入并体现在他们的日常实践和行为——在场景上的差异,应该与他们大致的政治取向差异相一致。”^{[4]282}在此意义上,文化场景有助于为政府的文化治理提供创新视角,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落地性提供依据。

在具体演进方式上,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授通过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3个主维度和15个次维度共同构建了场景理论分析框架,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取城市的文化特征。其中,真实性讲的是“何者构成你存在的本源,真实的你来自哪里”^{[4]51},它强调建构自我身份认同,是对社会个体身份内涵和意义的鉴别,即对“真”的认识。这一维度又包括5个次维度,即理性主义、族群、本土、国家、企业,旨在明确事物的本源。戏剧性强调展示形式,进一步设计了人们看待别人以及被人看待的方式,即对“美”的认识。它也包括5个维度,分别为迷人、睦邻、越轨、正式、爱炫。合法性关注道德规范,体现了人们裁决对或错的权威都是有

根据的,又可细分为传统主义、自我表达、功利主义、领袖魅力和平等主义5个次维度^⑤。

(二)场景理论的现实适用性

文化场景理论认为,每一个场景都可以从这3种维度进行分析,不同类型的场景组合能够熔铸城市独特的文化风格和多样化的美学特征。场景不是简单物质设施的堆积或混搭,而是孕育特殊文化价值的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混合体,展示与延续了区域的精神气质,是城市创新动力的重要源泉,有助于唤醒城市记忆、发扬城市精神,也是城市魅力与活力之所在。这就为捕捉不同地点蕴含的文化意义提供了强大的分析框架,为探讨如何激发城市活力提供了现实工具,对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从功能性城市迈向人民城市和文化城市,提供了转型发展的理念和现实路径。

当前,中国城市正处在大规模转型发展阶段,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呈现诸多新趋势。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权重不断提高,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文化开始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城市借助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品牌建设,只有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形成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景观,才能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留存于建筑间,对城市的营造滋养和市民行为规范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7]文化场景的建构,文化活动的展开有利于实现城市文化的沉浸式体验,促进城市文脉的更新与价值传承。这一场景与文化取向和价值理念相互交织产生的内生动力,在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建构了与社会共生共荣的发展模态。正是基于这种趋势,本文把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授提出的场景理论应用于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空间重构与肌理更新,旨在探讨场景理论激活运河沿线文化空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激发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以完成基于共同记忆的身份建构。同时,借助孕育于西方城市转型发展期的场景理论框架,在新语境中培育和孵化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并聚焦于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为我国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复建设、低质量建设、文化内涵缺失、空间缺失与浪费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考。以此为大运河

文化带的空间建构提供理论视角,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其与现代科技的交融提供借鉴,为新时代大运河发展培育文化动力,也为世界场景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提供实践经验。

场景理论的应用必须结合中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重新语境化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应用,要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地情、文化传承与对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诉求,建构符合区域文化空间特点的模式。在深入分析文化场景的现实表现,探究其生成机理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加深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消费现象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重在传承和保护文脉,提升文化空间塑造对人的现实关怀。也就是说,场景理论的重新语境化,其实是切合时代特点与现实境遇的一种理论框架与方法论的更新。由于生成背景与环境不同,其产生的“缺乏对虚拟文化场景的研究”和缺少对场景理论中国化运用统一评价体系等问题,势必会“激励我们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去探讨构建未来城市里的‘虚拟与现实共生’文化空间系统”^[8]。同时,在场景理论的重新语境化中,如何形成高度认同和具有共识性的评价体系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转换成中国化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至关重要。

二、山东大运河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营造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山东大运河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营造的政策引领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9]2018年,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都江堰、故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并举,强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继而,中央政府先后编制与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要求把大运河承载的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在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中坚定文化自信。

自2018年5月开始,山东省先后下发《关于印发〈山东省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2025年)〉的通知》《山东省精品旅游发展专项规划(2018—2022年)》《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等,强调以德州、济宁等五大运河城市为依托,以大运河文化为灵魂,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基因,重点进行运河文化遗址遗迹保护区、博物馆、历史文化名城等建设,不断促进产业层次更加高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效益充分释放,培育消费新热点,推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总体上看,大运河文化带是以文化建设为主体的带状区域发展战略,其关键是做好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同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滋养着沿岸运河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动璀璨的世界运河文化景象”^[10]。今天,我们面对这些人类共同的运河文明,如何传承中华文脉,做好河道、航运、生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好沿岸城镇和乡村可持续性发展,是世界上所有运河国家及地区的共同责任与担当。为此,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把握,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挖掘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为赓续中华文脉贡献力量,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资源,把大运河故事中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进行阐释与传播,“为焕发中华文明的永恒价值和蓬勃生机贡献智慧和力量”^[11]。

(二)以场景理论塑造山东大运河沿线文化空间的可能性

作为因运河而兴盛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山东大运河沿线的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是历史上交通转输和商品贸易的重镇,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留下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流传着许多历史传说和传统

技艺,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宝库”^[2]。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被赋予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传承人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意义”^[12]¹⁷,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

随着时代变迁,交通运输方式由航运向航空与陆路调整,以漕运为主的运河整体功能逐渐弱化,山东大运河的原有空间结构与昔日盛况已不复存在。加之,伴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诸多挑战,大运河系统性、全方位的遗产保护和文化展示力不足,保护、挖掘和阐释大运河所承载的优秀文化不够,“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所保存的文化遗产已经很少,有的已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13]。大运河附载的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日渐被遮蔽、湮没,运河的文化价值亟待被充分认知、体验和感悟,尚未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以文化塑造区域知名品牌的任务仍然艰巨,在促进和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能效应不明显,文化价值缺乏发掘、阐释和弘扬。南怀瑾曾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重在文化的传承……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14]²⁵⁵⁻²⁵⁶ 文化遗产不能止步于博物馆化,活态化传承特别是商业和产业开发是有效路径。由此,把场景理论应用于山东大运河沿线文化空间的场景塑造,从文脉的挖掘与保护角度对城市肌理更新,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台儿庄古城的活化是由场景塑造与地方文脉相互交织产生内生动力,进而促进城市发展的成功案例。自2008年开发至今,台儿庄古城在推动自身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也构成了与社会共生共赢的发展模态,其开发模式对山东大运河城市更新具有启示价值。台儿庄古城在原有历史遗迹的基础上,重视开发古运河、古码头、古建筑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把商品作为道具,服务作为舞台,环境作为布景”^[15],构建了生动鲜活的运河文化场景,复原了明清时期商贾云集的繁华街巷景色,成功实现了历史建筑与现代化商业形式的交融。在开发过程中他们注意把握运河开通和台儿庄战役两大关键时间节点,“即在运河中兴盛,又在战争中

毁灭”^[16],贯通历史与未来,注重历史文化脉络的梳理与延续,“这样的诠释更让台儿庄古城的重建上升到民族国家认同和世界和平的高度,而具有更重要的国家政治意义”^[16]。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真正融入城市文化命脉的传承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中,贯通历史与未来,成为城市活的灵魂,并贯穿在文旅融合与品牌创新中。完善的基础设施让游客沉浸复古体验的同时也不失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台儿庄古城重视智慧化古城与空间场景的美化融合,注重整合周边旅游资源,建成智慧旅游综合管理平台、大数据指挥中心、智能视频监控等多个子系统,对游客提供5G+VR的全景体验^⑥,有效唤起消费者的共同记忆,并实现其对古城文化保护与利用的认同。诸种措施不仅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也使城市更具魅力和韵味。今天的台儿庄古城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为“活着的古运河”“京杭运河仅存的遗产村庄”,成为中国古建筑修复与建设的典范^⑦。由此观之,场景理论的应用对于活化历史文化资源,赓续历史文脉,满足社会主流价值诉求,熔铸城市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这一成功案例也启示我们,在城市创新发展与旧城更新中,文化空间与场景的塑造绝不能人为地割裂与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而是要在多种文化要素的交融中凸显地域文化色调,在多元文化的包容发展中坚定文化自信。

(三) 山东大运河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营造的现实性

就场景理论应用的现实性而言,要站在民族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高度,高质量制定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以现实发展路径和具体实践活动呈现和发挥文化影响力,接续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增强山东大运河文化软实力和魅力,是塑造城市文化空间的着力点。“神州大地上出现了无数靓丽的景观,却越来越缺失文化的灵魂,只是一些罩着‘伪文化’的躯壳在游荡。”^[17]因缺失理论上的明白和清醒,一些旧城和老城的更新普遍存在拆掉真东西而伪造赝品的情况。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样化的历史遗迹,同时也面临优质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和开

发方式较为单一、对遗产保护支撑作用不足、城市景观与城市精神内在联系被割裂等诸多问题。如泰安古城风貌被粗暴毁坏,城市景观的地域文化特征被淡化,传统街区失去活力,历史空间氛围消失。聊城古城虽修筑了大量的仿古建筑,然而街道布局刻板,样式单调,致使旅游产品与运河关联度不高,传统民居与生活方式不同程度消失,“最终导致流传的地域最广、时间最长、历史积淀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古城相脱离”^[18]。这些弊端和遗憾需要在运河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中引起警惕,需要审视理论应用的可靠性与现实性,不可简单移植与挪用,更不可过度商业化开发或资源利用粗俗化与低端化。

同时,就本土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而言,山东大运河文化带的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等,依赖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积淀,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与生存方式累积下,逐渐凝聚为每座城市的精神风骨与文化价值追求,彰显着其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如“神京门户”“九达天衢”之称的德州,人文始祖伏羲和孔、孟、颜、曾、子思“五大圣人”故乡的济宁,“江北水城”之称、涵养出史前大汶口文化、拥有大运河上开设最早、关闭最晚、征税数额最大的临清钞关的聊城,因泰山而得名、被誉为“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泰安等,这些运河城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文物古迹及文化民俗遗存星罗棋布,为当下城市文化空间的场景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大运河文化空间场景塑造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创造性地运用“场景理论”,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以丰富的精神理念和文化底蕴引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生动展现大运河在推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探讨大运河文化肌理重构与现实条件的结合点,尤其要关注日常生活的场景表达,在城市文化建设中贯穿和强化独具个性的文化特质,形成鲜明的文化价值诉求,进而实现大运河文脉的延续与创新。

三、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场景塑造的现实问题与解决路径

(一) 重视地方文脉的提炼, 构建特色鲜明的文化场景

“城市总是有自己的文化, 它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方式。”^[19]¹³⁹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场景塑造需要在深刻阐释地方文化特色和深厚文明积淀中提炼文脉, 在文脉赓续中彰显城市文明的价值追求。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教授通过对比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场景与舒适物设施分布模式的差异, 阐明了“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大城市在文化上依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4]⁹⁸的观点。事实上,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积淀, 它体现在城市的宏观格局与功能布局、空间设计与设施改善上, 并因此而形成其特有的地域文化、建筑风格以及历史、文化遗存, 这些都成为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塑造城市品牌及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基础^⑧。

首先, 在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本地的历史文化, 以及原有的城市空间格局, 保持城市建筑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而割裂历史文脉。绝不能“大拆大建人为割裂了城市连接历史和现实的纽带, 弱化了城市应有的传统底蕴和本土特质”^[20]。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是延续文脉的重要载体, 如在济宁沿运河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运河古镇、古街巷、古建筑; 古运河德州段的老航船、码头旧址、传统民居等; 泰安以红门、岱庙南北为中轴线建成“‘通天街、仰圣街、傅公街、顺河街、升平街、大关街、灵芝街、财源街’, 史称泰安八大街”^[21]的独特城市布局, 都蕴含了地方文脉与城市文化表达。正如梁思成所说: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 在建筑上, 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 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 至于消灭的现象。”^[22]保护文脉要尊重历史、科学规划, 凸显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异质性与稀缺性。在城市文化空间和场景塑造中, 要注重城市、建筑、场景与人的情感链接, 把厚重的地

域文化特色展现出来, 摆脱千城一面的窠臼。

其次, 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要以鲜明的主题梳理历史文化资源, 使之与时代相契合。个人历史记忆的主题化梳理有利于形成普遍的文化共识, 并经由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定格在历史时空中。山东大运河文化带的景观和遗迹, 充分展现了古代工程的东方智慧, 那些见证漕运胜景的船闸、河道、桥梁与渡口等物质遗存, 保留原住民生活气息与风貌的古镇, 沿河而建的铺面、作坊和见证商海浮沉的会馆, 以及运河沿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历史文脉的显性展现, 显然具有唤醒人们记忆、激发情感认同的现实功能。在充分把握“场景理论”要义的基础上, 通过符号提取、空间演绎、意境传递等方法, 凝炼出具有鲜明价值指向的地域文脉。要借助创意和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和大数据等以实体建筑、特色活动塑造具有地域特质的文化场景, 使地方文脉融入城市景观、特色产业发展和城市建筑的方方面面, 以场景塑造并激活周边街区和城市发展的潜力。

最后, “人创造环境, 同样, 环境也创造人”^[23]¹⁷², 要使城市环境的文化趣味高度契合于场景的品位。在转向品牌城市、文化城市、公园城市的升级趋势中, 城市的空间布局是城市环境与自然、文化背景关系的整体体现, 要以系统性思维注重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城市的文化资源, 强调城市发展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山东大运河包含了广阔的地理范围, 孕育出诸多地域特征鲜明的城市文化, 如“上善若水, 大德之州”的德州, 拥有古八景^⑨的济宁, 有着“中国北方威尼斯”之称的聊城等, 流动的运河水承载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城市中的湿地、雨水公园等特色空间, 更为推动文化传播提供了大量鲜活素材和可开发性资源, 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伦理意蕴和空间意蕴。关注自然环境对城市文化的形塑与表达, 梳理传统的城市空间肌理, 注重城市新旧建筑之间的延续性与统一性, 推进山东大运河水文化遗产的开发, 可以形成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现代文化场景。以文化场景塑造为抓手, 可以有效解决山东大运河流域部分城乡建设挤占河湖生态空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 以及攻克对专项生态旅游产品和市场关

注度不够等发展瓶颈。对于满足沿线文化带民众的物质、精神和生态需要,提高整体生活品质,以及增强城市居住舒适度与城市吸引力,推动城市经济、文化、环境的繁荣共生,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围绕日常生活需求,激活文化的创新力

大运河文化延续至今,与运河沿线及其辐射区域的民众生活紧密关联。在过去城市文化发展中,兴建大型文化设施成为很多城市惯常的文化策略,这固然有利于吸引眼球,但因其“主要追求经济效益产出,与城市中的普通人生活总有些距离感、疏离感”^[8],使之与普通大众之间互动不够而缺乏亲近感,使市民产生一种“远”的隔阂。城市管理者往往将关注点更多放在文化地标和文化园区上,比较容易忽略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化空间、微观文化场所建设及文化氛围的营造,忽视了以文化人、文德教化的作用,其结果导致“对城市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不足,脱离民众、脱离生活”,文化场景必然在空心化中走向衰微^⑩。

当前,城市转型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不断凸显。随着“人们对于场景化的需求愈发浓烈,日常社交、情感联络、休闲娱乐都离不开场景化配置”^[24]。人是城市文化记忆的载体,是大运河文化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的塑造,既要追求具有时代特点的宏大叙事,更要关注地方化的、真实的民众日常生活图景。城市是人们记忆的储存地,而记忆体现在人与物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⑩。文化空间与文化场景的营造,只有反映当地的深层文化内涵,与至今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产生情感交流,才能真正产生文化共鸣,进而实现文化认同。大运河沿岸的原住民对运河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当地文化有着独有的理解和认知。只有在与实际条件的结合中激活文化资源,实现与当地、当代人生活的连接,才能延续文化传统,将文化血脉融入现代人的生产生活中,从而为大运河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只有“在大众文化中融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和民族的历史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传承”^{[25]64},才能实现文化的创新创造力在大众日常生活充分迸发。所谓日常就是要打破典藏式、展览化的割

裂式保护,注重文化场景“真实性”的体现,创造可以参与其中的、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要在公共空间和社区建设中体现更多风貌特色,让人们在共享这些社会场景“原真性”中感受文化的亲近感。这要求我们在文化场景塑造中,从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细处着眼,注重利用社区边角空间等营造文化氛围,形成“文化教育场景”,以丰富多样的文化表达,不断激发民众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欲,促进现实与历史的融合,让民众真切体悟和接受其内在的精神价值。

(三)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彰显城市精神

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生产力“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6]331}。以科技驱动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创新已成为推动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城市建设与发展都已和信息化、智能化、移动化的数字空间紧密融合。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虚拟技术的真实再现性与互动性特征,将会为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的塑造提供更广阔的前景,为地方文脉的传播提供更多平台和无限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在突出城市特色与日常生活场景审美表达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文化、创意、科技与城市文化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创造性地展示沿线城市大运河文化的历史与价值,吸引各类创意群体集聚,为带动城市文化创新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为城市发展培育文化新动能。

首先,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采集、检测文化遗产资源,梳理城市文化遗产的内在肌理与脉络,建立影像资料库和信息数据库,开展文物虚拟修复、展示和研究,为文化空间的开发提供智力支持。在实践中,需要特别注重将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成果与博物馆、文化遗址衔接,借助科技资源展现其中蕴含的艺术、科学与时代价值,还原再现历史场景,创造性展现运河沿岸城市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古老运河的魅力,真切体悟和接受其内在的精神价值。要赋予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新论的内涵与功能,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并延续下去的活态大运河文化,为展现运河城市文化风貌提供坚实的支撑。

其次,注重将城市精神与数字科技的融合最大限度发挥出来,把城市文化空间与场景塑

造与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充分激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要积极致力于历史故事、特色文化资源、民俗特产、工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如伏里土陶、临清贡砖、东平渔鼓、汶河大鼓、东昌葫芦、聊城杂技、柳琴戏、运河船工号子等。要积极推动融广大民众普遍喜爱与高新科技手段于一体的文化产品的产出,进而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文化遗产品牌。要通过客观物质符号生动演绎大运河文化故事,研发大批既代表民族文化,又被国际市场欢迎的优秀创意产品,夯实提升文化产业的价值维度,优化城市文化产业生态。同时,要发挥现代科技对文化内涵的凝聚与数字化转向等特质,不断培育城市的吸引力和活力,促使文化创意产业由量向质的跃升,带动沿线城市高新技术的普及与运用。

四、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营造的现实意义

山东大运河沿岸城市创造的丰富深厚、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坚定文化自信、增进共同情感认同、筑牢共同理想信念的源泉之一。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传承地方文脉,彰显中华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 and 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27]山东大运河城市空间和场景的营造,不仅可以固化和证实记忆,还能促进记忆持久且延续留存下来,进而将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实体化,让人们在场景空间内感受强大的文化磁场,不断增强情感交融,有利于塑造民族精神,唤起民族共同记忆,进而增强新时代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文化底蕴和核心竞争力,坚定文化自信,营造共筑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氛围,为传承中华文脉交出时代答卷,为焕发中华文明的永恒价值和蓬勃生机贡献智慧和力量^⑩。

山东大运河文化空间与场景塑造,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世界发展大局,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

的关键因素和前沿领域,要推动民族文化走出去,使其在新的文化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不断推动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创新创意凝练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促进城市建设与发展,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发挥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成为中国文明型崛起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点之一,对于抵御西方某些文化思潮对中华文化的消解,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大运河原本就是世界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中华文化之根基,在文明互鉴中相互交流,可以使大运河城市文化带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世界情怀服务更多人。以运河为纽带建构世界运河城市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价值,彰显大国风采,为世界大运河文化创新提供中国经验,有助于“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28]434}。

注释

①这其中包括德州市德城区、武城县、夏津县,临清市、茌平县、聊城市东昌府区、阳谷县、东平县、梁山县、汶上县、济宁市任城区、嘉祥县、鱼台县、微山县、滕州市、枣庄市薛城区、峄城区、台儿庄区。②参见管杰:《基于文化线路背景下的京杭大运河沿线城镇历史地段保护研究》,重庆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③参见钟晟、代晴:《场景理论视域下的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举措》,《中国旅游报》2006年6月19日。④丹尼尔·亚伦·西尔、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著,祁述裕、吴军等译:《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⑤丹尼尔·亚伦·西尔、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著,祁述裕、吴军等译:《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⑥贾景琳:《历史文化保护地发展模式研究——以台儿庄古城为例》,《城市建筑》2021年3月第18卷。⑦王明远:《台儿庄古城的重建:记忆重构、公共记忆与国家话语》,《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⑧刘平:《文化创意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模式及作用机制》,《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⑨古济宁八景:铁塔清梵、太白晚眺、墨华泉碧、凤台夕照、灌冢晴烟、南池荷净、西苇渔歌、获麟晚渡。⑩范玉刚:《“城市精神”提炼勿沦为“表演秀”》,《人民论坛》2012年第7期。⑪参见刘云:《城市地标保护与城市文脉延续——以美国地标保护为例》,中央美术学院2015年博士论文。⑫周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三个维度》,《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 求是, 2019(12): 4-12.
- [2] 徐奇志, 王艳. 大运河(山东段)文化遗产及其活态保护[J]. 理论学刊, 2018(6): 160-168.
- [3] 周蜀秦, 李程骅. 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机制与战略路径[J]. 江海学刊, 2013(6): 84-90+238.
- [4] 丹尼尔·亚伦·西尔,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著. 场景: 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 祁述裕, 吴军,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5] 吴军. 场景理论: 利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发展研究的新视角[J]. 湖南社会科学, 2017(2): 175-182.
- [6] 吴军, 夏建中, 特里·克拉克. 场景理论与城市发展: 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新理论范式[J]. 中国名城, 2013(12): 8-14.
- [7] 方天宇. 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创新: 城市改造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11(2): 44-47.
- [8] 余丽蓉. 城市转型更新背景下的城市文化空间创新策略探究: 基于场景理论的视角[J]. 湖北社会科学, 2019(11): 56-62.
- [9] 姚雪青. 千年运河焕发崭新活力[N]. 人民日报, 2020-12-14(05).
- [10] 黄杰, 程雨璠. 让古运河重生: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使命[J]. 江苏地方志, 2021(3): 28-31.
- [11] 周琪.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三个维度[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 5-9.
- [12] 付崇兰. 运河学必将万叶枝柯[M]//李泉主编.“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13] 阮仪三, 朱晓明, 王建波. 运河踏察: 大运河江苏、山东段历史城镇遗产调研初探[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38-42+54.
- [14] 余英时. 钱穆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 [15] 钱坤. 主题体验式购物中心设计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05.
- [16] 王明远. 台儿庄古城的重建: 记忆重构、公共记忆与国家话语[J]. 民俗研究, 2016(1): 136-142+160.
- [17] 范玉刚. 警惕“产业化”埋葬“文化”[J]. 人民论坛, 2011(30): 37.
- [18] 郑民德. 聊城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J]. 中国名城, 2018(10): 93-96.
- [19]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20] 范玉刚. “城市精神”提炼勿沦为“表演秀”[J]. 人民论坛, 2012(7): 42-44.
- [21] 张晓宁, 张群, 张莹. 弘扬泰山文化 保护历史风貌 塑造城市灵魂: 对泰安城市规划建设的几点思考[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0(2): 50-52.
- [22] 梁思成.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J]. 建筑学报, 1986(9): 3-7+82.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4] 李祥君, 袁凯健. 科技文创赋能超级城市IP: 金华城市展示馆[J]. 室内设计与装修, 2018(11): 46-49.
- [25] 范玉刚. 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和传播[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
- [26]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27]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 人民日报, 2014-10-16(01).
- [2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Cultural Space and Scene Shaping of Shandong Grand Canal

Fan Yugang and Xu Shiyi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orm a highly recognized and consensus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cene theory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 it into Chinese concept system and expression. Shandong Grand Canal is the Shandong section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pace needs to associate the concept of scene with local development and examine it in the cultural scene composed of public spac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itizens' consumption experience.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memory, we should explore the Shandong experience of cultural space and scene constru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reflect on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scen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so as to explain the practical value of explor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Grand Canal in Shandong.

Key words: scene theory; Shandong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cultural space; scene shaping

[责任编辑/李 齐]